



#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将据点里的军火、粮食全部搬走。由于事先安排得好，整体节奏非常顺畅，从动手到撤离，总共不到10分钟。只是有3名日军没有被打死，原因是他们趁着中午到附近的河里去洗澡了。听到枪声后，他们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吓得沿着铁路线逃跑了。

几天以后，气急败坏的日军集结成大部对黄庙据点附近的村庄进行报复扫荡。在李砥平和陈怀玉的安排下，乡亲们早已撤离隐蔽。日军扑了个空，只能无可奈何地回去。

陈怀玉讲完智取黄庙据点的故事，大家都非常兴奋，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别说他们一支小游击队能消灭20多名日军，就是我军一个团要消灭这些日军也很困难，大家都说，这是抗战以来最成功的游击战。王文彬让郭影秋帮助陈怀玉将黄庙战斗经过写成战报，上报山东省委，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整版报道萧县游击队攻击黄庙据点的战斗，新华社也发表文章表扬黄庙战斗，号召各地游击队学习，黄庙战斗成了我党敌后作战的典范。

8月5日，一股日军骑兵沿着徐丰公路开往丰县城，行至华山村边，遭到康文彬率领的义勇队第二总队丰县第六大队伏击。义勇队员先向骑在马上、举着日本旗的日军射出两枪，两名日军应声倒地。第六大队战士们一起开火，日军晕头转向，战马受惊，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日军小队队长马失前蹄，栽落马下，爬起来翻

滚到沟底，钻进路旁的高粱地里，被跟进的战士击毙。此外，第六大队还挥师到丰县徐老家和沛县康庄，一举歼灭了侵扰百姓、激起民愤的两股土匪武装。

各县的战斗捷报接二连三地传来，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各大队在苏鲁豫皖边区展开了一系列战斗，抗日的烈火迅速燃遍了整个微山湖西地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苏鲁人民义勇队第二总队也不断发展壮大，总人数达到了5000余人。

在郭影秋的老家铜山县东南马兰村一带又成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领头的名叫张文盛，是郭影秋在铜山县师范读书时一名要好的同学，慕名来丰县找郭影秋。张文盛说他们的游击队刚成立，希望和日军真刀真枪地干，但是，他们的人都是一些青年学生和农民，没打过仗，迫切希望能派几名军事干部去指导。郭影秋说，现在抗日的形势很好，抗日的力量风起云涌。但是，第二总队和各大队也普遍都缺军事干部，没法支援他们，就把马良集战斗、黄庙战斗、华山战斗几个战斗的例子讲给张文盛听，鼓励他们根据形势，发挥优势，勇敢战斗。张文盛临走时，郭影秋向他赠送了一首诗——《咏湖西起义兼送文盛同志东归》，歌颂苏鲁义勇队起义和湖西人民不惧生死的精神：

芦沟炮火接平型，血染徐淮草木腥。  
只学陈王能奋挺，漫言文士不知兵。  
旗传义勇联苏鲁，军号人民薄死生。  
湖上渔翁勤结网，伫看指日锁长鲸。

## 第十五章 国共携手抗战

正当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在湖西地区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时候，从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到湖西特委都没有意识到，应该抓住国民党县政府人员逃跑的有利时机，抓紧成立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政府！虽然也有乡绅和百

姓刘贞乾当县长，但是，教师和校长出身的刘贞乾没有当县长的经历，根本就看不起过去那些国民党的县长们，他对人们的劝告只是哈哈一笑，不当一回事儿。（未完待续）

## 《人间素颜：光炎诗选》 看见人间的烟火

日前，我市知名诗人姜光炎的最新诗歌集《人间素颜》，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诗集收录了姜光炎近年来创作的300余首现代小诗。

姜光炎的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诗歌报》《莽原》等三十余家报刊。他本人曾获《山东文学》首届腾飞奖、第二届“八喜杯”全国诗歌大奖赛二等奖、山东省作协征文奖等十余项省级奖励，曾出版诗集《冬夜听风》，公众号“光炎小栈”编发的作品备受广大诗歌爱好者好评。

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马兵说：“姜光炎的诗更多呈现出一种源自爱和正义的本色，语句单纯、语感亲切、语境透明，力避情感夸饰和想象虚浮，蕴真意于平淡，涵热情于沉凝，却又处处氤氲沉稳醇厚的人间滋味。”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 曲阜碑刻(八十一)

## 弘治十八年 李东阳奎文阁赋碑

张镇毅

在曲阜孔庙奎文阁廊下东首，一通弘治十八年的青石碑刻静静伫立。这通由明代内阁辅臣、“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撰文的奎文阁赋碑，既是文物珍品，更是承载儒家道统与政治期许的文化载体。文中对奎文阁建筑形制的记载与现存建筑完全吻合：“阁高三层，重檐叠构。葭覆黄瓦，脊饰吻兽；柱列丹漆，户映青琐。底层周以回廊，中层设以栏杆，顶层敞以四望。”明代重建奎文阁时沿用的“三层重檐歇山顶”形制、黄琉璃瓦，以及底层回廊、中层栏杆的布局，至今保存完好。赋文还明确了奎文阁的核心功能：“阁中藏书，皆历代圣籍，三代之彝训，六艺之宏纲，秦汉之载籍，魏晋之文章，唐宋之述作，元明之典章，咸聚于此，以俟来学。”可见奎文阁在明代既是“藏书楼”，更是“讲经堂”，兼具保存儒家典籍与培育后学的双重使命。

这通碑刻的诞生，源于弘治年间孔庙的重建工程。弘治十二年六月，特大火灾吞噬孔庙大成殿、寝殿等核心建筑，珍贵文物与典籍岌岌可危，奎文阁梁柱受损、藏书受扰。明孝宗朱祐樘“深为痛惜”，当即启动重建工程。历经近五年的修缮，孔庙于弘治十七年闰三月重现恢宏。工程竣工后，孝宗派遣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前往曲阜致祭。李东阳完成祭告大礼后，亲身游览重建后的孔庙，于弘治十八年春写下《奎文阁赋》，盛赞奎文阁“藏圣籍、传儒道”的神圣使命。随后，山东巡抚徐源奉旨将赋文镌刻上石，立于奎文阁前。

特殊的历史节点赋予碑刻别样意义。立碑之时（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已驾崩，武宗刚即位，朝政处于新旧交替的微妙时期。李东阳此时作赋立

碑，既是对弘治朝尊儒重教的响应，更暗含以儒家典籍教化新君、稳固统治秩序的政治期许。此外，衍圣公孔闻韶是李东阳的女婿，李孔两家的姻亲关系，让李东阳对孔庙、孔学有着更真切的情感联结，赋文中“我来谒庙，登阁徘徊”的句子，流露出亲身体察的真情实感，使碑文摆脱官话刻板风格，更具感染力。

作为珍贵文物，奎文阁赋碑的形制与工艺颇为考究。碑石为青石质地，通高2.8米、宽1.1米、厚0.3米，体量适中却不失庄重。碑额以篆书题写“奎文阁赋”四字，笔力遒劲；碑身上刻有赋文全文，共计896字，字体为楷书，字迹清晰规整，刻工精湛细腻，尽显明代碑刻艺术的水准。如果有人逐字品读碑文，便能深切领略其中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深度。赋文开篇精准勾勒奎文阁的地理方位与磅礴气势，“曲阜之墟，尼山之阳，庙有高阁，名曰奎文。上摩穹窿，下瞰泮池，左环泗水，右拱龟蒙”，寥寥数语便

点明其在孔庙中的核心位置。

古人认为“奎宿主文章”，孔庙藏书楼以此命名，便是彰显其文化意义。而李东阳对“奎文”二字内涵的进一步深化便是赋文的点睛之笔：“奎星为文之府，孔子为文之圣。阁以奎名，盖以圣文之所在也。文者，道之载也；道者，文之体也。无文则道不彰，无道则文不实。”这清晰地阐释了“文与道”的辩证关系，将藏书提升到“承载儒家道统”的高度。赋文结尾直抒胸臆，“嗟夫！圣道之传，赖于文籍；文籍之存，赖于斯阁。阁存则文存，文存则道存，道存则天下治矣”，直白点出朝廷重视奎文阁、珍藏典籍的根本目的——以儒家道统治理天下，这正是弘治朝尊儒政策的核心思想。

弘治十八年的明朝，虽有“弘治中兴”的治世表象，深层危机却已显现：北方鞑靼南下侵扰，南方倭寇袭扰沿海，财政亏空日益严重，官场腐败初露端倪。孔庙重建、奎文阁修缮与奎文阁赋碑的镌刻，正是朝廷试图通过强化儒家教化来化解危机的体现。辅臣李东阳对社会局势有着清醒认识，赋文中“当今天子，躬行仁孝，尊崇圣道，重建庙宇，复新斯阁，盖欲以文教化天下，以圣道安兆民”之言，既颂扬了孝宗的尊儒之举，也暗含对新君武宗的殷切期许。

今人驻足碑前，逐字品读温润遒劲的楷书，仿佛能触摸到李东阳作赋时的赤诚之心，感受到弘治朝尊儒重道的文化氛围。这通小小的碑刻，早已成为中华文明中“文以载道、道以化人”的生动见证，其承载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内核，在岁月流转中不断传递，滋养着后世之人。